

斯大林

论反对派

第九分册

人民出版社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 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¹¹⁹

(1927年7月29日至8月9日)

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

(8月1日的演说)

一 反对派对共产国际各支部的攻击

同志们！我想首先谈谈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各支部即对共产国际波兰支部、奥地利支部、英国支部和中国支部的攻击的问题。我想谈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们反对派分子，在这里在关于各兄弟党的问题上混淆视听，欺骗人们，可是我们在这里所需要的是是非分明，而不是反对派的胡言乱语。

关于波兰党的问题。季诺维也夫在这里大胆宣称，既然在波兰党内有以瓦尔斯基为代表的右倾，那就得归咎于共产国际，归咎于共产国际现时的领导。他说，既然瓦尔斯基有一个时期曾经有过（他确实有过）支持皮尔苏茨基军队的观点，那就得归咎于共产国际。

这是完全不对的。我想举出一些事实，举出去年七月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速记记录中你们都知道的那些地方，我想引用捷尔任斯基同志这样一个人的话来做证明，他当时说，如果波兰党内有过右倾，那末培植这右倾的不是别人，正是季诺维也夫。

这是在所谓皮尔苏茨基暴动¹²⁰时的事情，当时我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波兰委员会的委员和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其中有捷尔任斯基、温什里赫、我、季诺维也夫等人，曾经为波兰共产党拟定决议。当时季诺维也夫是共产国际主席，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草案，其中说到目前在波兰，当拥护皮尔苏茨基的势力和拥护波兰维托斯政府的势力之间的斗争日益加剧时，共产党采取中立政策是不能容许的，并且**目前也不必对皮尔苏茨基进行猛烈的攻击。**

我们几个人，捷尔任斯基也在内，当时表示反对，说这个指示是不正确的，它只会把波兰共产党弄糊涂。必须说明不但中立政策是不能容许的，而且支持皮尔苏茨基的政策也是不能容许的。在提出了若干反对意见之后，这个按照我们的意见修正过的指示被通过了。

我想借此说明反对瓦尔斯基算不了什么勇敢，因为瓦尔斯基犯了错误已经受到应得的谴责；但是嫁祸于人，把自己在波兰党内培植右倾的罪过，即季诺维也夫的罪过，推到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现在的领导者身上，那就是犯了反对共产国际的罪过。

你们会说这是小事情，我来谈论它是徒劳无益的。不，同志们，这并不是小事情。反对波兰党内右倾的斗争现在

继续着，而且还要继续下去。季诺维也夫竟有勇气（如果说得客气些）断言共产国际现在的领导是支持右倾的。但事实证明恰恰相反。事实证明季诺维也夫嫁祸于人，诬蔑共产国际。这是他季诺维也夫的惯技，这根本不是他的什么新东西。但是，我们的责任就在于每次都要揭穿他这种诬蔑人的伎俩。

关于奥地利。季诺维也夫在这里硬说奥地利共产党弱，它在不久以前维也纳的发动¹²¹中没有能够担负起领导的责任。这种说法也对也不对。说奥地利共产党弱，这是对的。但是否认它的行动正确，那就是诬蔑它了。是的，它还弱，但它所以弱，其中有一点是因为还没有那种能使群众革命化、使社会民主党瓦解并使共产主义成功的可能性迅速增加的深刻的资本主义的革命危机；它所以弱，是因为它年轻，是因为善于在左的词句掩护下进行右的机会主义活动的社会民主党“左派”¹²²在奥地利早已确立了统治，是因为不可能一下子就把社会民主党打垮。但季诺维也夫究竟要把问题说成什么样子呢？他只是暗示，却不敢明说：如果奥地利共产党弱，那就得归咎于共产国际。显然他是想这样说的。但这是一种手段拙劣的陷害。这是诬蔑。恰恰相反，正是在季诺维也夫不当共产国际主席以后，奥地利共产党才摆脱了搅扰，它的内部生活才不再遭受胡乱的干涉，因而才获得前进和发展的可能。奥地利共产党已经最积极地参加了维也纳事变，并博得了工人群众的同情，这个事实难道不是说明奥地利共产党正在日益成长，正在变成一个群众

性的政党吗？怎么能否认这些明显的事实呢？

对英国共产党的攻击。季诺维也夫要人们相信英国共产党没有从总罢工和煤矿工人罢工¹²³中得到什么好处，而且它经过这次战斗以后似乎反而削弱了。这是不对的。其所以不对，是因为英国共产党的比重正在日益增大。这一点只有瞎子才会否认。这一点只从下面的事实就可以看出：从前英国资产阶级没有认真地注意英国共产党，现在却相反，英国资产阶级疯狂地迫害它，而且不但英国的资产阶级，就是总委员会¹²⁴和英国工党也在组织疯狂的进攻来反对他们“自己的”共产党人了。为什么以前他们或多或少容忍了英国共产党人呢？因为过去英国共产党人还弱，在群众中的影响还小。为什么现在他们不再容忍，为什么他们开始向英国共产党人疯狂进攻呢？因为他们害怕共产党，认为它是一种力量，因为英国工党和总委员会的首领们害怕它，认为它是他们的掘墓人。季诺维也夫忘记了这一点。

我并不否认共产国际西方各支部一般说来还是比较弱的。这一点不能否认。但是原因在哪里呢？主要的原因在于：

第一、没有那种能使群众革命化、使群众行动起来并急速转到共产主义方面来的深刻的革命危机；

第二、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比共产党资格老的社会民主党目前在西欧各国的工人中间还是一种占优势的力量，共产党才出现不久，不能要求它们一下子就把社会民主党打垮。

尽管这样，西方共产党还是在成长，它们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还是在提高，其中有些已经成为、而另一些也正在成为真正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但是阻碍着西方共产党的迅速成长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反对派的分裂活动，就是现在坐在这里、坐在这个会场里的那个反对派的分裂活动。要使共产党迅速成长需要什么？需要共产国际钢铁般的团结，在它的各支部内不发生分裂。可是，反对派在干些什么呢？他们在德国建立了第二党，即马斯洛夫和路特·费舍的党。他们正竭力在欧洲其他国家内建立同样的分裂集团。他们，我们的反对派，在德国建立了有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和国会党团的第二党；他们明明知道目前的分裂不能不阻碍共产党的成长，但他们还是在共产国际内制造分裂，并且现在反而喊叫西方共产党成长缓慢，把责任推到共产国际身上！真是无耻到了极点……

关于中国共产党。反对派分子喊叫中国共产党（其实是它的领导）犯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孟什维主义的错误。这是对的。但他们拿这一点指摘共产国际的领导，那就完全不对了。相反地，共产国际经常纠正中国共产党领导上的错误。这一点只有瞎子才会否认。你们从报刊上，从《真理报》和《共产国际》杂志¹²⁵上可以知道这一点，你们从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可以知道这一点。反对派无论什么时候也没有举出而且也举不出共产国际有哪一个指示、哪一个决议会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内产生孟什维主义的倾向，因

为世界上就没有这样的指示。如果以为什么地方共产党内或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内产生了孟什维主义的倾向就一定要归咎于共产国际,那就太荒谬了。

加米涅夫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犯孟什维主义的错误,并回答说,就是因为共产国际的领导不正确才会犯这样的错误。可是我要问:德国共产党在1923年革命时期为什么犯孟什维主义的错误呢?为什么出现布兰德勒派¹²⁶呢?是谁支持布兰德勒派呢?反对派现在的首领托洛茨基曾经支持德国党中央委员会的孟什维主义的错误,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为什么当时加米涅夫不说布兰德勒派的出现是由于共产国际的领导不正确呢?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忘记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教训。他们忘记了:在革命高涨的时候共产党内一定会出现右倾和左倾,其中前者不愿抛弃过去,后者不愿考虑现在。他们忘记了没有一个革命是不发生这些倾向的。

在1917年十月革命时我们的情形是怎样的呢?难道当时我们党内没有右倾和左倾吗?难道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忘记了这一点吗?同志们,你们记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十月革命时犯了孟什维主义的错误的历史吗?当时为什么出现这些错误呢?这应当归咎于谁呢?这难道可以归咎于列宁或列宁党的中央委员会吗?反对派怎么能“忘记”诸如此类的事实呢?他们怎么能“忘记”在革命高涨时党内总会出现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右倾和左倾呢?而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列宁主义者的任务是什么呢?那

就是既要打击左倾分子,又要打击右倾分子。

托洛茨基的高傲使我感到惊奇,你们看,他竟对西方或东方的共产党的极小的错误也不能容忍。在中国,党还很年轻,它成立还不过两年,在那里出现了孟什维主义的错误,你们看,这竟使托洛茨基吃惊了。可是,托洛茨基自己在孟什维克中间徘徊了多少年呢?这一点他忘记了吗?要知道,他在孟什维克中间徘徊了整整十四年——从1903年到1917年。为什么他给自己十四年的时间来徘徊于各种反列宁的“派别”之间,然后才靠近布尔什维克,而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连四年的时间也不愿意给呢?为什么他对别人这样高傲,而对自己的徘徊却忘记了呢?为什么呢?所谓“公正”究竟在哪里呢?

二 关于中国

现在谈谈中国问题。

我不想多谈反对派在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问题上的错误了。我不想多谈,因为关于这一点已经说得很多,而且很使人信服,这里用不着再重复了。所谓中国革命在现阶段是争取关税自主的革命(托洛茨基),这一点我不想多谈了。所谓中国没有封建残余,即使有的话,也没有多大意义,因此,中国的土地革命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托洛茨基和拉狄克),这一点也不必多谈了。关于反对派在中国问题上诸如此类的错误,你们想必已经从我们党的报刊上知道了。

现在谈谈列宁主义解决殖民地和附属国革命问题的基本出发点的问题。

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处理殖民地以及附属国革命运动问题的出发点是什么呢？

就是把帝国主义国家(即压迫其他民族的国家)的革命同殖民地和附属国(即受别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的革命加以严格的**区别**。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是一回事,在那里,资产阶级是其他民族的压迫者;在那里,资产阶级在革命的各阶段上都是反革命的;在那里,作为解放斗争因素的民族因素是没有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是另一回事,在那里,别国帝国主义的压迫是革命的因素之一;在那里,这种压迫不能不也触犯到民族资产阶级;在那里,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阶段上和一定时期内能够支持本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在那里,作为解放斗争因素的民族因素是革命的因素。

不这样加以区别,不了解这种差别,把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同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混为一谈,就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离开列宁主义的道路,走上第二国际拥护者的道路。

请看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报告中对这一点是怎样说的：

“我们的提纲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之间的区别**。同第二国际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相反,我们强调这种区别。”^①(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210页)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注

反对派的基本错误就在于他们不了解也不承认一种类型的革命和另一种类型的革命之间的这种差别。

反对派的基本错误就在于他们把俄国这个压迫其他民族的帝国主义国家 1905 年的革命和中国这个被压迫的、不得不反对别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混为一谈。

在我们俄国，1905年的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它是反对资产阶级、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为什么呢？因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自由资产阶级不能不是反革命的。正因为如此，布尔什维克当时就没有提出也不能提出同自由资产阶级成立暂时的联盟和协议。根据这一点，反对派断言在中国革命运动的各阶段上也应当如此，在中国，同民族资产阶级成立暂时的协议和联盟，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是不能容许的。但是，反对派忘记了只有那些不了解并且不承认被压迫国家的革命和压迫国家的革命之间的差别的人才能这样说，只有背弃列宁主义而滚到第二国际拥护者方面去的人才能这样说。

请看列宁关于可以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成立暂时的协议和联盟是怎样说的：

“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①，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129页）…… “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注

具有革命性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资产阶级解放^①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211—212页）

曾经非常激烈地反对在俄国同资产阶级成立协议的列宁却认为在中国可以容许这种协议和联盟，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也许列宁错了吧？也许他从革命的策略转到了机会主义的策略吧？当然不是！这种事情所以“发生”，是因为列宁了解被压迫国家的革命和压迫国家的革命之间的差别。这种事情所以“发生”，是因为列宁了解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它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能够支持本国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革命运动。反对派不愿意了解这一点，而他们所以不愿意了解这一点，是因为他们背弃了列宁的革命策略，背弃了列宁主义的革命策略。

你们是否注意到反对派的首领们在自己的演说中如何竭力避开列宁的这些指示，害怕涉及这些指示呢？他们究竟为什么要避开列宁对于殖民地和附属国所做的大家都知道的策略指示呢？他们为什么害怕这些指示呢？因为他们害怕真理，因为列宁的策略指示推翻了托洛茨基主义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整个思想政治立场。

关于中国革命的阶段。反对派糊涂到这样的地步，现在竟否认中国革命发展有任何阶段。可是，难道会有一种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注

没有自己的一定发展阶段的革命吗？难道我国革命没有过自己的发展阶段吗？拿列宁的四月提纲¹²⁷来看就可以知道，列宁认为我国革命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土地运动为其主要中心；第二阶段是十月革命，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其主要中心。

中国革命有几个阶段呢？

依我看，应当有三个：

第一阶段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即广州时期，当时革命的锋芒主要是指向外国帝国主义，而民族资产阶级是支持革命运动的；

第二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国民革命军进抵长江以后，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离开了革命，而土地运动则发展成为数千万农民的强大革命（现在中国革命正处在自己发展的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是苏维埃革命，这个革命现在还没有到来，但它是会到来的。

谁不懂得革命不会没有自己的一定发展阶段，谁不懂得中国革命在自己的发展中有三个阶段，谁就一点也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懂得中国问题。

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特点是什么呢？

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特点是：第一、它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第二、它的锋芒主要是指向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如香港罢工等）。当时广州是不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和根据地呢？当然是的。这一点现在恐怕只有瞎子才会否认。

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正应当具有这样的性质，这对不对呢？我想是对的。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论述中国和印度革命的《补充提纲》中直接指出，在这些国家里，“外国的强暴势力始终阻碍着社会生活的自由发展”，“因此，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①应当是推翻外国资本主义”（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报告速记记录第605页）。

中国革命已经走过这个“第一步”即自己发展的第一阶段，走过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时期，而进入自己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土地革命时期。这个事实就是中国革命的特点。

相反地，例如土耳其（基马尔主义者）的革命却停留在“第一步”，停留在自己发展的第一阶段即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阶段，甚至不打算转入自己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土地革命阶段。这个事实就是土耳其革命的特点。

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在广州时期，国民党及其政府是什么呢？当时它们是工人、农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当时广州是不是革命运动的中心和革命的根据地呢？当时把广州国民党当做对帝国主义进行解放斗争的政府而加以支持的政策是不是正确的呢？当中国的广州和土耳其的安哥拉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的时候，我们援助广州和安哥拉是不是正确的呢？是的，我们是正确的。我们是正确的，我们当时是跟着列宁走的，因为广州的和安哥拉的斗争分散了帝国主义的力量，削弱并挫折了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注

帝国主义，从而便利了世界革命策源地的发展事业即苏联的发展事业。我们的反对派现在的首领们当时和我们一起支持广州和安哥拉，给了它们一定的援助，这是不是对的呢？是对的。谁来试试驳倒这一点吧。

但是，应当怎样理解在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的统一战线呢？这是不是说共产党人不应当加强工农反对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应当牺牲（即使是最小限度地、即使是片刻地）自己的独立性呢？不，不是这个意思。统一战线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有革命的意义，即它不妨碍共产党进行自己独立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把无产阶级组织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发动农民反对地主，公开组织工农革命，从而为无产阶级获得领导权准备条件。我以为报告人已经根据大家都知道的文件充分证明共产国际正是教导中国共产党这样理解统一战线的。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这里引证了1926年10月发往上海的一封唯一的电报。电报中说，在占领上海以前，暂时不应当加强土地运动。我绝不承认这封电报是正确的。我从来没有认为并且现在也不认为共产国际是毫无过错的。个别的错误是会有有的，而这封电报无疑是错误的。但是，第一、这封电报过了几个星期以后（1926年11月），并没有反对派方面的任何声明或表示，**就由共产国际自行取消了**。第二、为什么反对派直到现在对这件事绝口不谈，为什么他们**过了九个月以后**才想起这封电报，为什么他们把

这封电报**在九个月以前**就已经由共产国际取消了的事实瞒住了党呢？因此，如果认为这封电报规定了我们领导的路线，那就是恶意诽谤。事实上这是一封个别的偶然的电报，绝对不能代表共产国际的路线和我们领导的路线。这一点（我重说一遍）只要从下面的事实就可以看出：这封电报在几个星期以后就被一些规定了路线并且无疑地能代表我们领导的文件所取消了。

让我来引证这些文件吧。

例如**1926年11月**即上述电报发出后一个月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决议中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目前形势独有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过渡性，现时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的广泛阶层结成的联盟的前途以及进一步巩固自己同农民结成的联盟的前途之间应当有所选择。如果无产阶级不提出激进的土地纲领，它就不能吸引农民参加革命斗争，并将失去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权。”^①

其次：

“如果不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同等看待^②，广州国民政府就不能在革命中保持政权，就不能完全战胜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决议）

请看，这就是真正规定共产国际领导路线的文件。

非常奇怪，反对派首领们竟避开共产国际的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文件。

^{①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注

如果我引证我自己的**也是 1926 年 11 月**在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会议上发表的演说，或许不算是谦虚吧。这个委员会曾起草（当然，我也参加了）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这篇演说后来印成了单行本，题为《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下面就是这篇演说中的几段：

“我知道在国民党人中间，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有些人认为不能在农村掀起革命，他们害怕把农民卷入革命以后会破坏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同志们，**这是极端荒谬的。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就愈有力愈强大。**”

其次：

“我知道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有些同志认为工人为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法权地位而举行罢工是不应该的，劝告工人不要罢工。（喊声：“广州和上海都有过这样的事情。”）同志们，这是很大的错误。这是极严重地低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作用和比重。在提纲中应当指出这一极端不好的现象。如果中国共产党人不利用目前有利的形势，帮助工人（即使通过罢工的方法）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法权地位，那就是很大的错误。如果这样，中国还要革命做什么呢？”（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¹²⁸）

再看第三个文件，这是在**1926 年 12 月**发出的，当时中国各城市纷纷提意见围攻共产国际，断言展开工人斗争会引起危机、失业和工厂倒闭。文件上说：

“在城市中退却并收缩工人争取改善其地位的斗争的总的政策**是不正确的**。必须在农村中展开斗争，但同时必须利用有利的时机来改善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法权地位，用一切方法使工人的斗争

具有组织性，以免发生过火行为和冒进现象。特别是必须竭力把城市中的斗争引向反对大资产阶级，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者，使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尽可能地留在反对共同敌人的统一战线范围内。我们认为调解室、仲裁法庭这种制度是适当的，只要在这些机关中可以保证执行正确的工人政策。同时我们认为必须提出警告：发布反对罢工自由、反对工人集会自由等法令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第四个文件是在蒋介石政变前一个半月发出的。文件上说：

“必须在军队中加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支部工作，在没有这种支部而又可能成立支部的地方，必须把它们成立起来；在不可能成立共产党支部的地方，必须靠隐蔽的共产党员加紧进行工作。

必须坚持武装工农、把各地农民委员会变成拥有自卫武装的实际权力机关等方针。

共产党在任何地方都必须以自己本来的面貌出现，不容许随意采取半合法的政策，共产党不能成为群众运动的障碍，**共产党不当掩饰国民党右派的叛变的和反动的政策，必须动员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周围的群众去揭穿国民党右派。**

必须使一切忠于革命的工作者注意：目前由于阶级力量的重新部署和帝国主义军队的集中，中国革命正经历着危急的时期；只有在展开群众运动的坚决方针下，革命才可能获得进一步的胜利。否则革命就会遇到极大的危险。因此，现在实施指示比任何时期都更必要。”

更早些，还在**1926年4月**，即在国民党右派和蒋介石政变前一年，共产国际就警告过中国共产党，向它指出“应当使国民党右派退出国民党或把他们开除出去”。